

Chavannes

沙畹汉学论著选译

[法] 沙 畹 著

邢克超 选编

邢克超 杨金平 乔雪梅 译

中 华 书 局

沙畹汉学论著选译

〔法〕沙 畹 著

邢克超 选编

邢克超 杨金平 乔雪梅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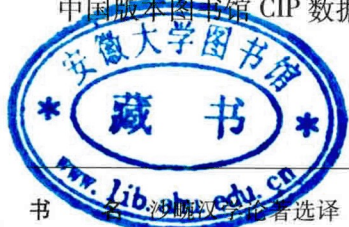
中 华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沙畹汉学论著选译/(法)沙畹著;邢克超,杨金平,乔雪梅译.
—北京:中华书局,2014.7
ISBN 978-7-101-10095-2

I. 沙… II. ①沙…②邢…③杨…④乔… III. 汉学—研究
—法国—文集 IV. K207.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66299号



书 名 沙畹汉学论著选译

著 者 [法]沙 畹

选 编 邢克超

译 者 邢克超 杨金平 乔雪梅

责任编辑 孙文颖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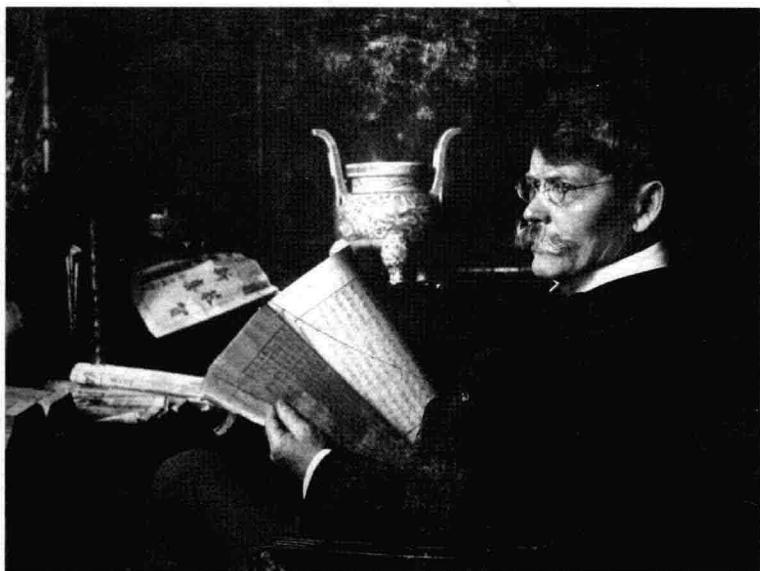
版 次 2014年7月北京第1版
2014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3 $\frac{3}{4}$ 插页4 字数270千字

印 数 1-2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0095-2

定 价 48.00元



沙畹(E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

(图片提供：法国亚洲学会)

目 录

爱德华·沙畹——同时代汉学研究第一人	戴仁 1
沙畹著作的接受与期待	荣新江 15

中国两份最早的地图	20
丽江地区的历史和地理文献	59
中国文学的社会角色	134
古代中国的社神	153
中国民间艺术中对祝颂的表达	209
中国对德行的褒扬	245
中国人的一些道德观念	265
突厥十二生肖	273

附录

爱德华·沙畹先生(金石与美文学院院士)

生平及作品介绍	勒内·杜索 350
沙畹	劳费尔 362
纪念沙畹	路易·德·拉瓦雷·普散 367
爱德华·沙畹	亨利·考狄 373

译者后记	436
------------	-----

爱德华·沙畹

——同时代汉学研究第一人

戴仁(Jean-Pierre Drège)

法国远东学院院长

1918年,亨利·考狄(Henri Cordier)在纪念沙畹的文章中评价他为“同时代汉学研究第一人”。当时,年仅52岁的沙畹(生于1865年10月,逝世于1918年1月)刚刚辞世,为后人留下了大量作品。沙畹以优异成绩完成学业并获得哲学教师证书后,与夏尔·安德莱(Charles Andler)合作,把康德的《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Premiers principes métaphysiques de la science de la nature*)译成法文(该书发表于1891年)。他本打算研究中国哲学,但考狄建议他转攻历史,尤其是中国廿四史之一的翻译。沙畹师从东方语言学院的冉默德(Maurice Jametel)——原法国驻北京公使馆翻译、《墨法集要》法译本的作者——和法兰西学院教授德里文侯爵(Hervey de Saint-Denys),学习汉语。最初,他被分配在洛里昂国立中学(Lycée Lorient)任教,不久后于1889年被派往北京。正是在那里,他开始着手翻译司马迁《史记》的前几卷。彻底放弃哲学研究后,他涉足中国研究的大部分领域:历史、文学、考古、艺术史、佛学、碑铭学……每一个领域的研究都令他乐此不疲。

在怀念沙畹的作品中,考狄所著最详。这不仅因为作者的能力强,两人相交甚深也是重要原因。1904—1918年间,他们共同主编由考狄创办于1890年的《通报》(T'oung Pao)。报刊的印刷交由莱顿(Leiden)的布里尔(E.J.Brill)公司负责,该公司拥有除国家印刷局以外在法国很难找到的中国汉字。本书译文中含有考狄撰写的沙畹传记,读者尽可从中领略到沙畹研究领域的广阔和内容的丰富。在这里,我只谈一下这位伟大学者多姿多彩职业生涯的几个阶段及一些主要作品,不再赘述其有关碑铭学的研究,因为在以前的一篇文章中我已谈过相关内容,文后附有《沙畹和法国的中国碑铭学》(estampages chinois de la Société asiatique),其中大部分来自沙畹的研究^[1]。

在北京生活四年后——期间曾回巴黎完婚,沙畹被调回法兰西学院,接替刚刚去世的德里文侯爵。之后他只回过中国一次,目的在于完成1907—1908年的考察。这期间他当然回到了北京,但更主要的是去了满洲至鸭绿江以及山东、河南、陕西和山西。沙畹参观了龙门、云冈、曲阜、泰山、太原、西安等胜地,驻足于司马迁墓前及武梁祠和孝堂山浅浮雕所在的登封地区,携回大量照片和拓片。根据这些资料,他撰写出一本巨著,其中包括两卷上千张照片和两卷文集,一卷研究了保存在山东的两汉石刻,另一卷研究了云冈、龙门及巩县石窟的佛雕。另外,沙畹几乎翻译了考察中收集到的所有拓片铭文。

在法国,沙畹涉足许多研究领域。除法兰西学院

(Collège de France)的工作外,1908年出任高等研究学校(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宗教学系教授,直至1912年由葛兰言(Marcel Granet)接替。1903年,他被选为金石与美文学院(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院士。他投稿《法国远东学院学报》(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在上面发表1907—1908年的考察结果,为刚刚创建于1898年的该学院做出贡献,支持那里的年轻人伯希和(Paul Pelliot),后者在与沙畹同期进行的新疆和甘肃考察中声名鹊起。

1889年,在中国的沙畹准备写一本有关司马迁及其著作的书,但这项计划未能实现。有趣的是,半个多世纪后,一位来巴黎对司马迁和希罗多德(Hérodote)作品做比较研究的中国历史学家——左景权(Zuo Jingquan)^[2]在另一种背景下重新拾起这项工作。相反,沙畹开始着手《史记》的翻译。1895—1905年间,他先后发表了《史记》的前47卷,即本纪、年表、八书和世家的一部分,没能继续列传的翻译。他的译文被世人公认为典范之作^[3]。该研究促使沙畹对中国古代史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尤其是有关音乐、编年史和历法的问题。几年后,他开始钻研十二地支纪年和与之相应的中国星象学中的十二生肖。十二地支与年代的更替相对应。在《突厥十二生肖》[Le cycle turc des douze animaux (1906)]这篇长文中,他追溯其根源并指出,十二生肖来自突厥甚至可以说来自匈奴,认为它由国外传入中国,西汉初期为人所识。但是,正如后来劳费尔(Berthold Laufer)、伯希

和及海因里希·吕德斯(Heinrich Lüders)指出的那样,十二生肖似乎确实起源于中国,6世纪中叶被突厥人借用。路易·巴赞(Louis Bazin)近期在《古代及中世纪突厥历法》〔*Les calendriers turcs anciens et médiévaux*(1974)〕中,对突厥历法进行了重要研究,这篇国家博士论文后来以《古代突厥编年体系》〔*Les systèmes chronologiques dans le monde turc ancien*〕为名出版(1991)。在这次步入突厥世界之前,沙畹对西突厥进行了长期和大量的研究。直至7世纪中叶,这个民族一直统治着中亚的大部分地区。沙畹整理出有关这个民族的所有中文资料〔《西突厥史料》, *Documents sur les Tou-Kiue (Turcs) occidentaux*(1903)〕。

1890年代旅居中国期间,沙畹在翻译司马迁作品的同时,对山东地区汉代浅浮雕极感兴趣。在武氏家族祭祠——武梁祠的参观,促使他写出了第一部作品《中国两汉时期石刻》〔*La sculpture sur pierre en Chine au temps des deux dynasties Han*(1893)〕。此书的出版再次引起人们对该地的关注。这座家祠在11世纪欧阳修时代为人所知,后逐渐被遗忘,1786年被黄易再次发现。此前,石刻和碑铭并未真正引起西方汉学家的注意。西方博物馆在此前不久才开始收藏第一批拓片。S.W.布谢尔(S.W.Bushell)于1881年为大英博物馆收集了一批,他大概是第一位。1891年,沙畹带回一些,1907年,关野贞(Seikino Tei)也带回一些。同时,其他西方人分别为科隆、斯德哥尔摩、芝加哥和哈佛博物馆携回几批。1907—1908年

考察之后，沙畹在前人——当然是黄易，以及翁方纲和王昶的研究基础上进行了初步分析。

1900年代初，通过加布里埃尔·莫里斯（Gabriel Maurice）神父，沙畹获得一套比较完整的西安碑林拓本。几年后，他在考察中又得到一套，谢阁兰（Victor Ségalen）也存有一套，但都不完整。沙畹谢世后，他收集的这些碑铭分散在吉美博物馆、国家图书馆、亚细亚学会、塞尔努什基博物馆等几家法国机构。

这些收藏品帮助沙畹撰写了一些颇具启发性的文章。1903年，根据1137年刊刻在石头上的两幅地图——《华夷图》和《禹迹图》，他发表了一篇有关中国古代地图绘制史的论文，在翻译了图上的题注后，回顾了自汉朝第一批木刻地图起中国地图的主要发展过程。当时，人们还不知道1989年发现的放马滩木制和纸制地图的存在。他认为裴秀（224—271年）是中国地图绘制术之父，随后谈到谢庄（421—466年）制作的木制拼图地图及《西域图志》和《西域图记》地图，这些都没能保存下来，甚至在敦煌发现的沙州和西州地志后可能附有的地图也是如此。沙畹还研究了唐代贾耽和与之同时代的李吉甫和元稹绘制的地图，直至11世纪沈括设计的立体地图。

根据碑林拓片，沙畹还提炼出多份文献，并写出两篇文章：据1587年刊刻的版画撰写的《洪武皇帝（1368—1398）圣谕》〔*Les Saintes Instructions de l'empereur Hongwu*（1913）〕和《防寒九日经九篇》〔*Les neuf neuvaines de la diminution du*

froid(1904)]。第一份文献是一个道德说教的范本,皇帝下令将石上刊刻的内容复制在木板上向全国推广,激励民众一心向善,简明的插图使不识字的人易于理解劝诫之辞。

对历史的钟爱使沙畹尤为注重古代史,但这并不妨碍他在中国之行后涉足现代中国的研究。他研究了 1894 年的朝鲜战争、1895 年的中日甲午战争、1900 年的光绪皇帝、1901 年的义和团运动,甚至 1906 年的铁路。

然而,他主要还是在古代和中世纪中国的研究上发挥自己的才干,尤其是中国边疆地区及对外关系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他属于那种从边缘入手研究中国历史的西方传统派汉学家。依靠历史资料和碑铭文献,他撰写了多篇有关云南地区的文章。首先是一份有关南诏王国的碑铭(1900 年),随后是其他几份有关彝族(卢鹿)的碑铭,其中一份是汉文凤诏家谱(1906 年),或与爨氏家族相关的碑铭(1909 年),最后是一篇有关丽江历史和地理文献的研究(1912 年),这一地区与中华帝国的关系在独立、自治和归附之间交替。在这篇分量很重的文章中,沙畹首先把 1841 年木氏宦谱的手写本和《西藏图考》中的七条路线译成法文,随后对资料进行分析,并与《明史》中的相关内容对照,文后又附上 1548 年和 1561 年两份刊刻在石鼓上的碑铭译文。他依据的大部分碑铭拓片和照片,来自传教士、官员或像亨利·多伦(Henri d'Ollon)进行的那种地理、种族考察。他还翻译了一整套云南碑铭以及山东和其他地方的碑铭,这些都是元代文物[《元代碑铭及汉文

奏章》，(Inscriptions et pièces de chancellerie chinoise de l'époque mongole, 1905—1908)〕。

沙畹大部分工作研究的是中国与西域的关系。他首先翻译的是义净法师西游印度的故事——《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1894)，这是伟大的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第一部由法显著述，第二部是玄奘的作品，分别由雷慕沙(Abel Rémusat)和儒莲(Stanislas Julien)译成法文。他还研究了多本游记：8世纪的悟空行记(1895年)、6世纪的宋云和惠生游记(1903年)、10世纪的继业游记(1904年)、旅居中国的5世纪的求那跋摩(Gunavarman)(1904年)和6世纪的阇那崛多(Jinagupta)游记(1905年)，以及与印度学家席尔万·列维(Sylvain Lévi)共同完成的王玄策出使记(1900年)。

中亚一直是沙畹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他曾在有关突厥的作品中予以探讨。因此，他依据伯南先生(Charles-Eudes Bonin)带回的拓片，发表了多篇碑文译文，尤其是敦煌的四篇碑文和在龟兹发现的刘平国墓碑铭文。1900至1901年间，斯坦因先生在新疆进行第一次考察，回来后将所得中文资料委托沙畹研究，这些写于木简和纸片上的残卷有些发现于和田和吐鲁番附近，为唐代之物，有些发现于尼雅地区，为3世纪之物，还有一些发现于敦煌地区，为西汉之物。这个不朽巨著直到1913年才出版，然而沙畹已于1905年发表了一篇资料详实的论文，研究纸发明前的中国书籍。同时，他还翻译了《魏略》(1905年)和《后汉书》(1907年)中有关西域的记述。

中国和西域地区的关系必然将沙畹引向宗教问题的研究,这超出了朝圣者和佛教徒所走路线的问题。沙畹始终以碑铭资料为依据,并从在哈喇和林遗址发现的碑文(1897年)入手,研究景教和摩尼教。源自近东或中东的外来宗教常常在中文文献中不加区分,直到现在,对它们的准确鉴别一直是一个尚待讨论的问题。敦煌手抄本的发现促使沙畹再次涉足摩尼教研究。他的学生伯希和曾向罗振玉展示一份手抄本,后者将其拍下并于1909年在北京出版。1911至1913年间,师生二人正是根据这份由伯希和带回巴黎的手抄本发表了一篇约350页的长篇论文,研究这一宗教在中国的出现。

在宗教领域,沙畹同样对纯粹的中国崇拜感兴趣,如对社神的崇拜。1901年,沙畹首次发表了一篇有关社神的文章,在一本关于主要圣山之一——泰山——的重要专著中(1910年),他再次使用该文全文,将其作为补编出版。在论及社神的文章中,沙畹阐明了社神崇拜如何形成,该神是土地能量的化身,分为不同的品级,家庭、乡村、府郡直到皇帝各有自己的社神。他还解释了如何用五色土建社坛,并描述了各种崇拜元素:树——指明神灵所在位置,主或石柱,主宰大地并包含宇宙间一切阴气的社神的职权,霖雨或干旱以及日食时社神的作用,它与惩罚和战争的联系。

沙畹对道教进行了研究,在一篇重要论著《投龙简》中(1919年逝世后出版),他讲述了一种宗教习俗,即将题写或刻在石头或金属上的祷告扔进壁龛、沟壑或溪流中,这些祷告会被龙带到天上。他介绍和翻译了掌握的所有相关材料,

并习惯性地运用了碑文和历史原始资料。这里，他参照的是道士杜光庭(850—933年)的作品。

然而，如人们所见，更能吸引沙畹注意力的却是佛教，尤其是旅行者和翻译家。从1894年起，他与席尔万·列维、拉德洛夫(Wladimir Radloff)、胡特(George Huth)合作，共同研究居庸关六体字碑文，这是一篇佛经，用汉、蒙、藏、梵、回纥、党项六种语言写成。1896至1897年间，沙畹又投入到对五份碑文的研究之中，它们由中国朝圣者所写，刻于菩提迦耶。由此，他和施古德(Schlegel)形成竞争，这导致两人不和。然而后者去世后，却是沙畹接替他管理《通报》。在生命即将终结之际，沙畹还和席尔万·列维合作，一起探讨佛教教士等级称号以及十六罗汉(1915和1916年)。但是，他更热衷于佛教文学，尤其是故事和民间传说，以及它们从印度传至中国的过程。这导致他翻译了《汉文大藏经中的五百故事和寓言》(*Cinq cents contes et apologues extraits du Tripitaka chinois*)，于1910至1911年分三大卷出版。

沙畹的作品一直表现出对文学和民俗的兴趣。入选法兰西学院时，他发表了该领域的第一部作品，在1893年12月5日讲授的第一节课上，谈论了中国文学的社会角色。此文与沙畹的其他作品迥然不同，一方面，他面向相对广泛的公众，除法兰西学院的同仁外，还有知识界的其他代表；另一方面，沙畹向全面论述发展，甚至发表对中国形势和居民状况的评论。他首先指出，中国文学之所以能广泛传播至安南，这得益于其文字，它能使外族人，如朝鲜人、日本人、安南人

和喀什人理解汉文学。中国文化的同化能力破解了北方民族的入侵,虽然蒙古人和满族人成功进犯,但他们甚至忘记了自己的语言。虽然秦始皇试图焚书,但由孔子修订的经典作品逃过此劫,它具有古代理想化运动的性质,表现为教化意图。沙畹看到欧洲玄学和科学与中国道德之间的对立,他在孝的问题上着墨甚多,认为它是“连接一代代人的神秘纽带的象征,使家庭比个人更重要,使被当作天下的国家又比家庭更重要”,是真正的“和谐法则,它主宰着自然力量的规律运动”。同样,欧洲人不予关注的礼仪实际上只是“不同精神状态的象征”。沙畹解释说,经典存在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当中,社会地位尤其是德行都受到教育的影响,文学与道德密不可分。此番陈述后,沙畹又谈及他眼中的科举制弊病。他认为,记忆力在教育中所占的分量磨灭了考生的其他能力,从而出现了一批词藻华丽而浮夸的作家,而不是中国急需的工程师,“书本扼杀了思想”。因此,不必对文人阶层敌视欧洲文明的事实感到惊奇。沙畹指责,中国传统教育的产品缺乏推理的严谨和观察意识,这使 19 世纪末的中国成为一个走向衰落的民族。但沙畹并非一味地斥责,他表达了内心的希望:“人们不会赞同如此关注精神事物的民族会彻底消亡。”沙畹赞扬中国人民的忠诚以及孝和礼的调节作用,并诚邀同代人研究中国——这个必将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民族。在安南和北部湾,中国文化的影响颇深,对于在此定居的法国人而言,即使是为了更好地实行统治,也必须深入了解中国。这是一个殖民时代,在法国,几乎没有人将法

国在印度支那的出现视为不正当的举动，而沙畹的话并没有别的目的，只是激励人们更好地认识中国，如同已经得到广泛研究的埃及和亚述。

几年以后，沙畹重新探讨伦理道德问题。1904年11月，即当选为德微里亚(Gabriel Devéria)继任者的第二年，他在金石与美文学院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对德行的褒扬》(Les prix de vertu en Chine)的讲话。他谈论了为祝贺受皇帝奖赏的人而刊登在《京报》(La Gazette de Péking)上的颂词，以及为他们竖立的牌坊——一般由本人或家庭出资。他再次提到德行与学问之间的联系，由于学识渊博，杰出的文人常能受到奖赏。沙畹本人是道德主义者，他指出这些做法造成浪费，将立碑的钱用于救助穷人无疑能更好地发挥效用。另外他还指出，对德行的褒扬势必会引发虚荣心的膨胀。然而，贫困问题非常普遍。在西方，人们采取措施反对酗酒，为老人建立收容所和养老院。沙畹指出，这种亲情关系的表现与中国的某些做法很相似，如人们创立永久性基金会，以帮助同一家庭或同一氏族中的穷人。这种家庭捐赠制度并非20世纪初的新创，其想法可追溯至11世纪。沙畹非常关心寡妇的悲惨命运，出于对丈夫的忠贞，她们自杀以在阴间追随亡夫，竖立的牌坊能永久保留对她们的回忆。孝的事例数不胜数，都应同种方式加以褒奖。沙畹继续漫步于《京报》之中，他又注意到一些由于忠诚几乎被视为圣人的人，他们或者是灾难发生或作战失败后自行了结的文官武将，或者是被认为有特殊功绩的人，为他们建立的众多庙宇遍布中国大地。如果

神灵行善，比如（干旱时）降下大雨，也能受到皇帝褒奖。透过陌生性和差异，沙畹通过这篇文章，再次力图向他的同胞展示一种必须深入研究的文明的全部财富。

逝世前夕，沙畹再次谈及中国人的道德观念，1917年6月7日，在法中协会于巴黎大学组织的讲座上，他做了相关发言。此时的背景不同以往，因为中国刚刚参与对德战争。按沙畹所讲，德国应负全责的水下战争暴行造成了中德外交关系的中断，并激起中华民族的愤慨，该民族一直牢记孔子的教诲：“见义不为，无勇也。”一段时期过后，我们现已知道，在袁世凯死后发生的骚乱中，中国人在应采取何种态度的问题上分歧极大，西方强国施加压力，欲将中华帝国卷入冲突，以便为了他们的利益取消德国租界地。另外，西方列强允许中国当局五年内免交赔款——由于义和团袭击外国公使团，西方派兵远征北京，于1900年解救了他们，中国必须支付一定的赔偿。此外必须指出，远征军当时由德国将领指挥！在讲话中，沙畹再次谈到孔子学说及其道德思想在中国人民生活所占的分量，以及责任、正义、孝、祖先崇拜等问题，这些力量保证中国在穿越历史的过程中依然保留自己的主导原则，同时不妨碍她在近期也借鉴了西方的民主。

大致回顾了沙畹的著作之后，很难忽视他偶尔涉足的艺术领域的作品。他曾写过两篇文章，一篇是关于卢浮宫博物馆的中国绘画（1904年），另一篇是关于塞尔努什基博物馆的佛教艺术的远播（1913年）。此外，他还评注了保存在大英博